

第一章 革命主题的凸现

一、世界革命潮流的兴起

19 世纪是西方人向全球扩张的大殖民时代。到 19 世纪末 全部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已在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下，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体系——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西方国家在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的同时，给世界造成了许多深刻的矛盾：西方国家国内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矛盾，国际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国家利益矛盾。20 世纪注定是要西方为其造成的后果付出代价的时代。

20 世纪刚开始之际，欧洲还陶醉于 19 世纪的成就中，充满着喜气洋洋的乐观主义情绪和种族优越感。他们认为白人是“适者生存”中的强者，上帝赋予他们管理其他低能种族的责任。在政治

上 欧洲是世界的宗主国。在经济上 欧洲成了世界银行和世界工场。在文化上 整个世界都在模仿他们 从各种制度、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到思维方式。这些都使得欧洲出现了一种幻觉 既然自拿破仑战争后 欧洲将近一个世纪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那么 在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积累了更多的内政、外交和殖民经验的欧洲人眼里,20世纪将是一个更为幸福的时代。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天才的马克思在理论上作了详尽的分析,预示了危机时代的来临。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性的矛盾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他与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所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正是现代革命运动的突出特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预言在20世纪中兑现了。只是不是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东方的落后国家 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成熟的产儿 而是作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途径。这是因为20世纪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首先在政治上把西方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使现代革命运动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和广泛性。

殖民者的幸福是建立在被殖民者的苦难上的。在殖民时代,先进的工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如人口、资金、资源、阶级冲突等等 都在殖民地的扩展中得到了缓解。当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形成强大的垄断能

力，世界一体化的速度加快，列强之间的冲突就突出出来了。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强国要向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讨回一份利益，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这正是强权者的公理。从 19 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对殖民地的争夺中，英、德、法、俄等国相继为控制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发生冲突。欧洲试图以联盟体系来维持相互之间的利益和均势，却导致了世界大战更快地到来。在欧洲打破均衡的是德国，在亚洲则是日本。

19 世纪末，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正在慢慢地觉醒。亚洲以其雄厚的文化传统，对欧洲的霸权构成了最早的反抗。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在西方是白人种族主义傲慢的偏见，在东方则是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当以传统的武器盲目对抗近代化的第一轮反抗失败后，20 世纪初，落后国家普遍生长起了接受工业文明成果来实现民族发展和独立的意识，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进行了最初的调整和回应，以现代民族主义激发起新的民族活力。

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最大目标，列强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格外尖锐和激烈。《辛丑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机会均等”。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分别在 1899 年、1900 年向各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拥有势力范围的强国必须维持 5% 的中国关税，允许各国商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经商而不得加以歧视。这是维护各国在华特权、缓和争夺中国的矛盾、实现“利益均沾”。它在自由贸易原则的标榜下，实际上带有各列强国相互牵制、保持某种均势的意思。英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从抑制日本和俄国的考虑。日俄这两个和中国

毗邻的帝国主义国家 是两个最贪婪的强盗 对中国领土都有勃勃野心。

在义和团期间 俄国借口保路 派兵占领了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 各国军队陆续从华北撤走 但俄国军队仍赖在东北不走。它不仅要强占东北，还窥觊朝鲜。这就严重地威胁了日本的在华利益和大陆政策。1902年 日本与英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积极备战。1904年 2月 6日 日本对旅顺口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争夺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 也是 1870年以来列强间的第一次战争。双方调动了大量兵力进入东北，沈阳大会战动用兵员 62万人，为人类历史至此所见的最大战役。日军继攻占旅顺 取得陆上胜利后 又在对马海峡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 取得海上胜利。

在美国的调停下 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绝对控制权和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并割取了南部库页岛。

日俄战争还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俄国内部的矛盾，俄国爆发了 1905年大革命。几乎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起来反对沙皇专制政府，整个民族都在罢工，沙皇被迫宣布结束独裁专制 制定宪法 民选议会杜马 建立一个立宪政体。俄国大革命给被压迫民族一个启示 在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面前 即使强大的沙皇也必须屈服。

俄国曾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日本对它的胜利震动了世界。日俄战争对亚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生长有双重作用：一方面 日本的成就和俄国革命的鼓舞 刺激了亚洲的民族主义的生长。它是非白人对白人的胜利，打掉了白种人种

族优越的傲慢 使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感到振奋。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宣传 企图使人们在同种族的观念下 忽略日本也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事实。同时，日本以半个世纪的发奋图强，从受欧洲人欺凌的落后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也给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先例。只要打破封建的枷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引进自己的祖国 就完全能摆脱欧洲人的控制 和欧洲列强并驾齐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孙中山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在国际、国内诸矛盾的推动下 亚洲觉醒和革命的时代来临了。伊朗在 1905 年、土耳其在 1908 年、中国在 1911 年先后爆发了推翻旧王朝的革命。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亚等国家与地区也出现了日甚一日反对宗主国统治的骚动。

另一方面 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 积蓄起来战胜俄国的力量。侵略中国是它的既定国策。日本的胜利使其帝国主义扩张野心更加膨胀 也更加傲慢 更有资格对老牌的帝国主义说“不”。它把亚洲当作自己的禁脔 而侵略中国是它实现独霸亚洲的第一步。同时 作为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虽然发展速度快、冲力大 但根基浅 国土资源薄弱 缺少殖民经验，在实现其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时，更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日本的崛起 打破了老牌帝国主义在亚洲相互牵制的平衡 更让中国感到来自“黄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

1914 年，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凯歌行进的资本主义世界 在推进全球一体化中积累起来的内外矛盾一并激化 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面危机。大战期间，欧洲强国忙于相互厮杀 日本趁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 给正在生长中的亚洲和中国民族主义以强烈的刺激。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东方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西方的现代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沟通了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中国是处于多个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在东方争夺的焦点，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必然和世界革命潮流的涨落密切联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 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都会在中国得到迅速回应。帝国主义时代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正在纳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带来了解决自己问题新的基础和新的认识角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 被压迫民族觉醒 汇聚成世界性革命潮流时 中国民族复兴的革命也就找到了它的时代根据 纳入到世界性的革命潮流中。冀望于在新的世界革命中振兴中国的观念，成为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柱。这个观念久久地在中国的政治天幕上盘旋，影响至深至远。

二、传统政治秩序的分崩离析

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离北京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西安。颜面丢尽的晚清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的上谕，揭开了穷极图变的清末新政的序幕。

这道上谕概括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如下：“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 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太多 豪杰之士太少。文

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①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

4月21日清中央政府成立政务处作为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在1901年至1911年期间，清政府陆续颁发各种章程命令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改革措施。

新政主要措施有：

第一 奖励工商。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鼓励个人资本的自由发展。1903年 成立商部 着手制定商律 设立铁路、矿物、农务、工艺各公司 颁布了一系列奖励章程和先后颁行了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1907年 设邮传部交通银行，1908年将原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清政府还先后对著名工商界人士授给名位荣誉。

第二 改革军制。裁旧军 练新军。即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 编练新军 设立武备学堂。新军从洋操训练 使用洋枪洋炮，要求士兵具有一定文化，军官则素质要求更高。1903年 在北京成立练兵处 袁世凯实际掌握大权。他统率下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1906年，改兵部为陆军部。

第三 改革教育。废科举、办学堂。清政府两度颁布学堂章程。1905年，停止一切科举考试，成立学部。省府州县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新史学研究会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1年版 第81页。

立大、中、小学堂。初步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及各学科的近代教育体制。同时，提倡和奖励出国留学。

第四 改革行政。改组机构、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对原有机构进行了一些合并、裁减 如撤裁詹事府、通政司、东河河道总督 漕运总督 改组旧机构为新机构 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 新增部分机构 如商部、学部、巡警部等。

第五 改革法制。删改《大清律例》 制定新刑律。改革“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结构 制定了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等部门法和单行法规。实行“政刑”分离 试行司法独立。改全国司法系统为县、府、省、中央四级三审制 并设立检察厅。司法、行政从此开始分立。

这些“新政”措施 虽然有些是洋务派人物早已提出过的，有些是在戊戌维新时已推行过的 但“新政”比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走得更远、更广泛和更深刻。这不是说明清政府具有了胆识 实是时势所迫。

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 要求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呼声高涨 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 在 1905年 12月派载沣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考察的结论是“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存。”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以封建性最浓厚、与封建王权结合最紧密的日本模式为君主立宪蓝本。1908年清政府宣布立宪筹备期为 9年 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筹备的开展 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宪政改革轨道 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原则，削弱和限制了君主专制。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1910年在北京成立资政院。1911年，提前成立新内阁。

清政府出于王朝自救目的历时 12 年的新政 是 20 世纪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 客观上加速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变化。

政府出面倡导实业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国内投资建厂、办实业出现一个新的高峰 近现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与之同时迅速发展 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改革 使军人的成份发生变化，军队知识化程度提高；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改变了社会的知识基础和仕进结构，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 大批青年出国留学蔚然成风 大量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被介绍到国内 行政改革对体制臃肿、权限不分、效率低下的旧弊端进行了调整 触动了旧专制体制中最保守的东西 法制改革改变了“德主刑辅”的中华法系 推进了法制的近代化 封建专制受到近代法律的一些约束和限制。此外，清政府还修订了消除满汉畛界的政策 在民间开展革除缠足、吸鸦片等陋习的运动。

然而 对于一个腐败透顶的政权 改革的强心剂反而会更快地要了它的命。清末的新政并没能延长帝国的寿命，反而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庚子之变后的中国 中央政府权威丧失 法纪废弛 财政拮据 人心散乱 民变风起云涌 革命派要推翻王朝 改良派要改造王朝。清王朝既然丧失了戊戌变法的改革先机，那就得承受起更大的改革代价，这不是只凭纸面上的诏令就能度过难关的。但清末新政的自救意识大于改革意识，统治集团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恰恰全面暴露了清王朝的自私、落后、狭隘、保守、腐朽等致命弱点 承担不了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

从统治集团上看：满族贵族们想利用改革排斥汉族官僚，

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加深了集团内部的满汉矛盾。从国家组织上看：整个官僚机器已腐朽不堪，官僚队伍腐败无能，贪赃枉法，萎靡不振，缺乏有现代政治意识的干才，道德形象败坏。没有一个廉洁高效公正的政府，冲不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就无法有效地动员人民支持改革。没有凝聚力的改革，只能走向改革者愿望的反面。

本来庚子赔款已使人民难以承受，改革所需费用更增加了民众的税收负担，官吏又从中中饱私囊，苛捐杂税繁多，百姓怨恨日甚，激成了各种民变。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农民造反等等骚乱事态愈演愈烈。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满清帝国的统治已成土崩之势。

新政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的措施，本是为了王朝自救，反而成为摧毁王朝的条件。

奖励实业，本是为了发展民间资本，解决财政危机。但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又与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最后在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上，爆发了反抗清政府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办新式教育、鼓励留学，本是为了培养维护王朝的新知识人才。然而接受新知识的结果，不仅培养出和旧王朝离心离德的新知识分子，而且直接培养出来了以埋葬清王朝为己任的大批革命党人。

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加强巩固帝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大部分受近代军事训练出的新军都成为清王朝的叛军。武昌起义，由新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宣布立宪，本是为帝国谋求长治久安的政治改革。然而，清政府半心半意的反反复复，立宪运动中一波三折，则使王朝

权力出现结构性失衡，作为政权基础力量的士绅们对现政权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呈内轻外重的格局。立宪派日渐与王权疏离，构成了推翻王朝的另一股力量。

在清政府的新政中，帝国的基础实际瓦解了。士绅与王朝的关系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已经割裂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由于立宪的实行而更加疏离。皇帝和督抚的关系也更为紧张化了。

镇压维新变法的刽子手转而来继承维新变法的事业，本身就带有历史的嘲讽意味。清王朝的道德力量本已江河日下，在变革中又不具备认识世界大势的眼光，没有从国家大局着眼的责任意识和驾驭改革全局的智慧，冥顽不化的秉性在改革中暴露无遗，使人民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改越乱、越革越糟的新政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王朝最后的权威人物慈禧、光绪死后，这条风雨飘摇的破船就无可挽回地要沉下去了。

三、革命与改良的变奏

当社会变革条件已经成熟，变革已形成一种历史趋势时，改革若不能以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就会增加历史发展中的暴力成份。戊戌变法的失败，自上而下的改革受阻，尖锐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必然使社会变革的力量由社会上层向中、下层转移。在 1900 年一年中，由得风气先后而形成的政治地缘差异，衍生出了三种武装暴力形式：以盲目排外和民间传统反抗意识为导向的力量，北方出现了武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

以维新变法为导向的力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行动。以推翻清王朝为导向的力量，在珠江流域形成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革命的惠州起义。

这三次暴力的行动都失败了，但失败后的结局却差别极大。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其盲目性、落后性而退出历史舞台。自立军“勤王”起义，以唐才常等 200 多人被捕杀而告终。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此再不作武装“勤王”之想。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是他继广州起义后的第二次起义。起义历时半月，弹尽援绝，终告失败。但惠州起义的失败，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孙中山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① 这三种不同的结局，预示了 20 世纪的变革，将以更激烈的形式出现。

孙中山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现实更为敏感。最初他曾寄希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的富强。1894 年，他北上天津，向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论政，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此举没得到李鸿章的重视，孙中山遂出国到檀香山考察农业。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1895 年，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4 页。

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 并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 孙中山被视为“乱党”逃亡国外 考察西方社会 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探讨救国之道。在英国伦敦 孙中山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所执 幸而被救。这些磨砺更加坚定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志向。

康有为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中最早“得风气之先”者。 年 他发动“公车上书” 鼓吹维新变法 聚集起了一批变法图强的维新人士。他们通过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传播维新思想 游说公卿大臣 很快就开创出一番局面。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朝野呼应，风靡全国。其声势、其影响、其作用 远远不是孙中山们限于广东一隅的武装起义活动能比拟的。 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海外 鼓吹保皇 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一时无出其右。兴中会的檀香山分会、日本横滨分会 经梁启超等人的一番游说，多数会员竞相转入保皇会。

世纪初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强烈刺激使革命走出了寂寞，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培养出的大批具有新文化素养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执行人。继兴中会之后，1904年华兴会、科学补习社在湖南、湖北先后成立 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此后，江浙皖一带成立了光复会。在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日本 集中了大批爱国志士 成为反满运动的大本营。1905年8月 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 确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 创办《民报》为鼓吹革命的喉舌。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 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会员多系自由加入 人物混杂 思想纷陈 派别

对立。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组织松散的革命会社。尽管革命党人的团结还很不稳定，但革命毕竟有了全国规模的组织系统，毕竟有了自己的纲领旗号。这是革命力量空前的进步。革命党人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是争取会党和新军，多次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形成气候的革命派为阐明革命的合理性，与改良派开始了公开的争论。1905年到1907年，以孙中山的《民报》为一方，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为一方，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大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在已经进行改革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排满革命能否招致外国干涉；（二）中国社会必须首先建立开明专制的立宪政体，还是可以直接建立共和政体；（三）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排满革命上，对当时中国社会上的具体问题涉猎不多。双方各持一端，在相互抨击中又有相互补充。当时的一名学生，后来的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回顾说：“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又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情感上的营养。”这场大论战，在知识界传播了新观念，发展出了一套新语汇。它所提供出的精神食粮和知识体系，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崭露头角，传统知识分子成为了古董。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已经囊括了维新变法时改良派提出来的东西，具有新意义的是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是改良派施展的新天地，他们相继组织立宪团体，围绕着限制君权、实行议会政治的总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1906年12月，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

宪公会。康有为也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

立宪派同样不乏爱国的真诚。正如当时一篇名为《立宪魂》的小册子所言：“救国是前提，立宪是目的”。1905年，由上海总商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全国各地响应。在收回利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立宪派都起了领导作用。立宪派重视开启民智，他们创办报刊，开办讲习班，翻译出版西方政治法律著作，鼓吹宪政，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普及宪政知识。同时，立宪派还领导了几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了宣传动员。在立宪运动中，人民的参政意识、自由、民权观念得到提高，民主觉悟有所发展。这些推进民主的工作正是处于非法状态的革命党不容易做到的。

立宪派为争取议会制度，推翻专制制度做了很大努力。不管清政府多么虚情假意，立宪本身意味着清政府承认封建专制制度的破产。立宪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防止了集权制度下的权力滥用。各地方的立宪派普遍以刚刚建立的咨议局为依托，用所争取到的一些参政议政权对地方行政官员评头论足，揭露腐败，要求改革弊政。政治性的集会、游行、请愿、罢课已是司空见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有了一些自由。

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日本针锋相对的论战，并不妨碍在国内推进变革中的互为支援。革命派武装反清起义对清政府造成的恐惧和压力，给改良派推进宪政创造了条件。改良派推进宪政的种种活动，提高了民众的民主觉悟，给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造成了情势。当清王朝发觉自己的权威在改革中流失殆尽，进而要抑制时，革命则给了它最后一击。

从 1906 年到 1908 年 革命党人进行多次起义 都被清王朝轻易地镇压下去了。1909 年以后，情势发生了变化。1909 年各省咨议局建立，开会议事，立宪派充分利用这个合法机构 出面组织请开国会运动 在 1910 年一年间发动了三次请愿。清政府不仅拒绝了三次请愿，还强行驱散请愿代表。这使立宪派大为失望 对政府立宪的诚意丧失信心 许多人感情上倒向了革命。1911 年 5 月，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这是一个满人占大多数的“皇族内阁”。全国为之哗然。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绝望 怒火中烧 革命派更以先见之明的卓识 宣传反满革命的正确性，抨击清廷的欺世盗名。反清的大联合局面终于出现了。

1911 年 4 月 孙中山、黄兴等经过 5 个多月精心准备 集中精英，全力一搏，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几个小时就失败了 同盟会许多优秀干部牺牲 士气遭到严重打击。正当革命党人筹谋下一步如何行动时，清政府为自己的最终覆亡准备了绞索。

1911 年 5 月 清政府“皇族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 遭到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民众强烈反对。四川反抗风潮尤其激烈 立宪派领导成立了保路同志会 全省抗缴捐税，骚乱愈演愈烈。清政府忙从湖北调集军队前往弹压。湖北革命党人趁武汉空虚之际 于 10 月 10 日发动武昌起义 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武昌起义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各种反清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一个多月 全国 18 个省便有 15 个省宣布独立。1912 年 1 月，南京革命政府成立。2 月 清帝宣布逊位 清王朝灭亡。

四、未奏全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调适和维护旧的社会系统，而是要建立一个新质的社会系统。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帝制是由无数传统观念和政治习惯构成，并支持无数传统观念和政治习惯的权威象征。帝制的倾倒，使旧政治力量的复辟失去了依托的权威，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制度失去了支撑的中心，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上了一个句号。报刊上“独夫民贼”、“封建余孽”的称谓，道尽了帝王的权威扫地。同时，辛亥革命以强烈的历史震撼力，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使民主、共和、法治、议会等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把整个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的基础。

革命党人积十余年的苦斗，屡败屡起，前仆后继地进行武装反清起义，终于在武昌一役获得戏剧性的成功。这主要不是凭借本身力量的优势，而是靠百折不挠的奋斗中树立起来的革命形象。就革命组织而言，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当属同盟会。但同盟会也是内有派系，风潮叠出，接连发生过几次组织分歧。革命团体内部龃龉不断，妨碍了革命力量形成有机的整体。就革命纲领而言，各革命团体在纲领上各有己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并没有得到完全认同，在平均地权上分歧尤其大，有的只同意一民，有的同意二民。只是在排满的民族革命方面，大家认识是一致的。就革命策略而言，革命党主要做发动会党和策动新军的工作，搞起义甚至暗杀等暴力行